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3

1979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4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近代史资料

总40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7¹/₂印张·171千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1,000册

统一书号：11018·798 定价：0.71元

目 录

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M. 伯纳尔 (1)
五十年经历 ·····	柏文蔚 (4)
冯国璋往来函电 ·····	吉迪 辑 (63)
憩园存稿 (选录) ·····	徐鼎霖 (125)
中华民国内阁篇 ·····	张国淦 (150)
热河密札订补 ·····	史文简 (232)

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M. 伯纳尔

编者按：这段资料系丘权政、符致兴同志译自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康奈尔大学 1976 年版)一书的第 65—66 页, 为该书第三章“孙逸仙”中的一部份, 今标题系译者所加。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年初, 孙中山自英赴德, 后又由德去法, 进行革命活动。但他这年春天在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这段史实, 一般资料中未见记载, 这段译文可供研究孙中山活动和思想之参考。马丁·伯纳尔书中介绍的是当时报纸对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情况的报导, 其中报导的孙中山的谈话, 并不是原话, 又经过了辗转翻译, 因此不一定很准确。如报导孙中山的纲领“驱除鞑权的外来人……”部分, 应是两个多月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之意。凡此, 均请读者注意。

孙中山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一致, 可从他在一九〇五年春第二次赴欧旅行中得到证明, 当时他访问了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八日, 佛兰德语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Vooruit) 有一篇短文记述了他们的讨论, 几天后它的法文版(Le peuple)也有报导。这次讨论似乎用英语进行, 因此语言的困难和作者关于中国的乌托邦观点, 肯定对这篇报导有所影响。但是, 看来这篇报导多半还是确实可信的:

这星期我有幸成为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 我们的孙逸仙同

志,和我们的朋友王德威尔得(樊德维)及胡斯曼的中介人。

孙同志来比利时,是为了向社会党国际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该局的书记是胡斯曼同志。

孙同志首先扼要地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们的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满洲人),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而且中国有一种十分简单的财政制度:每人按其财产付税,而不是象欧洲那样,把负担单独放在大多数没有财产的群众身上。

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

中国工人发现他们自己还处在过去许多世纪行会一样的地位。他们全组织起来了,境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都好。象中世纪的工匠一样,今天中国工人的生活是远非可怜的。穷人很少,而真正富有的甚至更少。

行会是反对使用机器的,……中国人一点也不笨。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他们知道欧洲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么痛苦,因而不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牺牲品。这是他们处在落后状况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同志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

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

五十年经历

柏文蔚

编者按：柏文蔚是辛亥革命和1913年讨袁战争的重要人物，以后又参加护法战争，1924年赞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他的自传对于这些历史事迹，提供了许多资料。我们曾访问过他的子女柏心瀚、柏心慧等同志。据柏心瀚同志说，自传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湘西闲居时写的，由他誊清，未保留原稿，后来誊清稿亦毁。柏心慧同志说，这份自传是她的亲戚（也是柏文蔚的秘书）抄录的副本，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删去了蒋介石所忌讳的部分。今据此抄本付印，酌加简注。

（原《五十年大事记》辛亥革命回忆，内容包括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时代）

壬申炎暑，热气袭人，避居山中，觉嚣尘俗鄙之怀为之顿消，不但医我血压高，且可却我功名热。每当风晨月夕，闭目独坐，偶有所思，五十年如一梦，实白驹过隙耳。其间奔走流离，惊涛骇浪，使高堂忧惧，家族议讥，亲邻讪笑，果何为者？不有以记述而揭明之，余之生也，将不知何所为而来，及其死也，又不知何所为而去。故五十年之经历，有不容已于自述者。按年索想，历历在目；笔之于书，事皆翔实，不敢铺张，不敢炫耀，言为心声，以质诸世之掌月旦者，其加以褒贬焉。是亦著者之心愿也。谨缀数言，以志篇首。

余世居安徽寿州，始祖由山东迁寿州，至余已七世，历代青箱也。余质鲁钝，而记忆力甚强，脱襁褓后，事无巨细，悉能历数不忘。甲申年余九岁^①，已开始读书。丁亥十二岁以后，已读完《山

① 柏文蔚生于丙子年五月十七日（1876年6月8日）。

海经》、《尔雅》及《四子书》。至己丑十四岁，七经皆可背诵。惟午夜自思，均非济世之学。又悟及天圆地方之学之误谬，由是终日闷闷郁结不开。然为家庭与社会环境之压迫，亦只有精攻试帖八股，以消磨岁月而已。余尝喜浏览鉴史子集，教者禁之，而凤洲《纲鉴》及《庄子》、《老子》、《韩非子》、《墨子》各书皆于室外林下乘隙读之。当时世之学者，无所谓各种科学，无所谓专门学，维日孜孜不倦者，皆不过俳优之具耳，于人类所需社会进化之学，何所取焉。然余虽决意不为弄文舞墨之事，但为事实不许，实无脱此羁绊余地。讲道德，说仁义，忽忽悠悠，遂不知不觉又迫近考试时代。余既以八股试帖，不济实用，又无其他专门可学，乡村农圃之事，窃喜为之。农学丛书，潜心研究。常与老农老圃，遵守节令，选择种子，按时植树栽菜，播种五谷。胼手胝足，处之夷然，不以为苦。余膂力过人，负重可百余斤。父母钟爱甚，常诫勿伤力，致成疾患。余慰之曰：“青年不吃苦，长大游手好闲，怀安败名，甚为可怕。”父母欢悦。

又余家自洪杨反清战争之后，家产荡然，所余田产无几。兼之连年荒旱，收获不足糊口，父母操持家务，困苦已极。余父在家教读，余至十六岁时，常代父授课，同学亦皆守秩序。同学功课未稍荒废，故其家族均无异言。盖因余家自清咸同年间，已成破落户。光绪初年家徒四壁。余父收学生十余人，年可获束脩数十金，以作家用。余深知家庭苦况，维持私塾不倒，可全名誉，且有收入，即自兢兢业业，劝同学按日读书。同学亦乐于就范。约三年之久，名义上系余父为师，实际上确余在私塾负责也。

壬辰年，余十七岁，中国旧文学可谓已得门径，为文亦可清通。余父命余考试。余以功夫未深，要求再延三年后应考。余父亦欣然许之。至光绪二十三年丙申，余已二十一岁。余父率余应试，至州城府试，五场皆中。九月院试，学差为李端玉，命题以能后篇为

多，诗题为“凉秋九月”，得陵字，竟一发而中。兰衫鹤顶，炫耀一时，乡人羨之，父母悦之。余终以为经国大计不在此雕虫小技也，遂立志研究新学。彼时都人事^①谓之洋务，余不遗余力以图之，世人评论，非所计也。

余自二十一岁后，乃就馆于蜀人吴少海家，学生男女三人，脩金年三十串。但余对此项工作甚感苦闷。学生吴玉良年幼聪敏，颇解余意。与谈治乱兴衰之道，政治不良，若不根本改革，无以自强，吴生印象甚深。忽忽两年，驹光一刹那耳。余决计改图，不再授课。乃商得余父同意，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开始，在家经营农业。但当时既不知农村合作方法，亦不懂农村组织各种利益，未数月即被余父所阻，而告失败。不得已仍回城，于端午节后开馆授徒，重入牢笼，甚非所愿也。

自甲午之役以还，倭寇益逞。中国人民在满清政府重重压迫下，过着极其困穷和痛苦生活。余与邑人三五知己，如孙少侯（毓筠）、薛少卿、张树侯、朱金甫等，创立阅书报社，藉以研究救亡图存之道。彼时上海只有《申报》一种，油印甚劣。又梁启超在湖南创立《湘学报》，印刷亦同《申报》，吾人皆视为金科玉律。此外有郑观应之《盛世危言》，吾人皆作为配上天书。惟当时新势力未张，旧势力仍强，维新派仍不敢畅所欲言，行所欲行。惟于紧要问题，积极地以谋改革，如改良藏书楼，创立天足会等，揆时度势相机行之而已。

己亥年，余二十四岁。满清政府反动腐化，对汉人压迫手段日酷。在此情形下，余益不能在家安居，遂决然赴省，自谋出路，而吴生亦形影相从。因人地生疏，困难实多。适皖省以求是学堂改为安徽大学堂，陈请投考，当道许之。乃与吴生联袂考入该校，于六

① 此处原稿如此。

月入校肄业。

次年庚子春^①，有留日学生陈仲甫、潘赞化等以中俄新定密约之故，回国宣传反对，到皖召集各校学生在藏书楼开会。是时参加者，安徽大学堂及武备学堂学生各数十人。因余之言词激烈，安庆府知府出而干涉，学校总办刘葆良、总教王泳霓识浅胆小，助纣为虐，以致两校参加会议之学生，被迫不敢进校，余遂愤然退学，而革命情绪更一发而不可遏。是时在山东、直隶等省，爆发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直接干涉，攻入北京。余更愤激万分，呼号奔走者殆半年。在南京与张通典、赵声、江暉、汪聿本诸人，联合当地会党，组织强国会，藉谋推翻满清政府，以抗外侮。事被泄露，同志杨作霖君遇难，所组亦停顿。余又走安庆。适安徽武备学堂，一二三班学生毕业后，无所事，提调谭学衡呈请巡抚，成立武备学堂练军。是年辛丑，余乃投入充学兵。一年以后，军学稍得门径。壬寅年夏，满清政府派铁良视察长江，至皖检阅武备练军，许其成绩优美，而兵士多系举人、廪贡、秀才之优秀分子，当奏请满清政府以学生考试卒业，发文凭焉。

在辛丑、壬寅两年时间内，为进行革命活动，避免官厅注意，余特创立同学会，藉以联络各方面革命同志。既不限于同校同学，更打破省界。以是党徒日众，以黄花亭杨氏试馆为通信办事机关，以南庄岭西端密茂之松林中为集议之所。所有宣传品如《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中国魂》^②等，每散布皆达万余份。而熊成基读《扬州十日记》时，乃至流泪不止，余因之与订交焉。

① 此处记叙有误。俄迫订新约，当为辛丑春事。

② 以上各书确是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传品。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出版在辛丑、壬寅（1901—2年）之后。此处盖就少年所读之书，概括言之。

癸卯六月，余二十六岁，在武备练军卒业后，乡人张之屏，亦革命之急进者，与太和会党领导人郭其昌接洽，欲集合万人，至皖起事。郭即下令召集党徒。事阅半月，余始知之，颇觉时机未至，不宜盲动。乃与郭研究。郭已无法收回成命，余以时机紧迫，即迁出营外。岂知当夜四处火起，但无一处枪声响应，而郭君已被满人绞死狱中矣。次日大索谋乱之人，臬司濮梓同为武备学堂总办，到校索余，余闻信乘小舟顺流至大通，转赴南京，匿居王府园承恩寺胡济臣处，不敢出面者月余。旋与陈仲甫、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诸君作皖北之游，乃又结识江湖侠义之士石敬五、宋建侯等。

甲辰，余二十九岁，由皖北来至芜湖。是时郭其昌已死，徒众四散、官厅究缉之事亦渐寝息。于是由湘迁芜之安徽旅湘公学，易名为安徽公学，主持人为李光炯，邀余入校。是时所延请教师，有精于汉学之刘光汉君，化名金少甫，组织黄氏学校，专门从事暗杀工作。余与李光炯诸友，皆刺血为盟加入团体。旋以排满革命，徒众宜多，主义虽定，宣传宜广，又于中学及师范两校以内集学生之优秀者联络组织成立岳王会。盖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此种组织，陈仲甫、常恒芳皆最重要分子也。会员入会用江湖上宣誓方式，绝对秘密。后又在安庆成立分会，吸收对象主要是军人。而会员为了运动军队，投入新军当兵的也不少，后来形成一部分强有力的革命力量。秋九月，江南征新兵，赵伯先任三十三标第二营管带官，招余往任队官。余以欲实行革命非蓄养武力不可，乃决心辞去学校教师而往投赵声营中，充当前队队官焉。

乙巳年，余三十岁，充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前队队官。当即在南京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会，朝夕与赵声等研究进行革命工作。然障碍甚多，动招破坏。为了集中革命力量，将左队队官易

人，畀之杨国弼。是时第二营在赵声领导下，余与杨君为基本，内而向士兵宣讲革命，外而与各界革命同志联络，得到很大便利。此时在南京比较重要之革命同志，如陆师学堂之陈绍濂、吴士初^①，三江师范之汪菊友，三十五标统林之夏，与余等联系最为密切。是年秋，孙中山先生派吴暘谷来组织长江流域同盟会，余首先领导岳王会全体同志加入。其他如赵声、林之夏、冷遯、伍崇仁、孙麟、韩金声、林述庆、何遂、杨韵珂、倪映典等均以次加入，当即公推赵声为长江盟主，另设机关于鼓楼之东，并选定玄武湖之湖神庙为会议地点。由吴君呈报中山先生批准，特派员赍印信及委任状到宁，并颁发会章，公布革命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此以后，我们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集中意志，遵照会章，积极向前发展焉。继之则陆师学堂之陈绍濂、吴吉初，警察局之李玉斋、张侠琴，三江师范之汪菊友均相继加盟，而学生兵士闻风加入者千人以上，构成以后革命之良好基础。是时赵声升任三十三标统带，余与伍崇仁、林述庆皆升任管带。三十五标统为林之夏。为宣传革命，在内场功课外，另加精神讲话一门。野外演习多在明陵附近行之。林之夏原任三十三标教练员，与三十三标官兵本有特殊情感，嗣升三十五标统带，故常在野外与三十三标官兵会合，其演说感人之深，士兵中多有为为之坠泪者。南洋第九镇革命深入之种子，赵、林之功伟矣。

孙毓筠字少侯，安徽寿州之贵族也，以候补道资格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奉孙中山先生命，回国至南京，与青年学生五、六人携大炸弹四枚，是准备炸死端方者^②。到南京后，首先与余及赵伯

① 下文作“吴吉初”，原文如此，不知孰是。

② 端方于丙午（1906年）七月中始调任两江总督。《孙毓筠供词》说丙午年十月后由日本回国。柏氏回忆，误记提前一年。

先联络，乃将炸弹藏余队室。是时赵伯先升任三十三标统带，余与伍崇仁、林述庆皆升任管带。第九镇统制为粤人徐绍楨，亦有心人，故吾人革命行动，得其暗中保护颇多也。

丙午年，余三十一岁。正月，孙少侯以机关被奸人破获，少侯与学生权仰之、段自强皆被捕^①。余乃将所存炸弹置于标房院内井中，幸未破露。赵伯先因受清政府注意已离职，代之者为余大鸿，乃一旧官僚也。余等对革命工作不得不暂时隐避。乃少侯供词中，与端方高谈政治，且保荐人才。余与冷遁皆在彼保荐之中，更引起端方之畏忌。势难久于其位，遂于是年正月去职，而投往吉林胡殿甲所统之吉强军焉。是年三月以胡殿甲之推荐，得至延吉厅效力，充吉强军之文帮带兼马步队总教习。溯迹旧军，对革命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过人生地疏，比较困难耳。延吉者，于清光绪年间，开厅治，放官吏，惟腴削平民为能，所谓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牲多之处。日本人垂涎已久。谓之为“间岛”。因其地在豆满江之北，海澜河之南，中间成一极大区域而得名。至是每日皆有日人三五成群，络绎不绝，西北至宁古塔；东北至珲春；西南至长白山，其来路皆由高丽之会宁，渡图们江，经我六道沟而至延吉厅，皆有测量地图。清政府文武官吏，昧然不知利害，良可叹也！

夏五月，日本人来延吉者益众，其重要者如谋并韩国主要分子陆军大将松川敏胤，亲自到延吉视察多次，其侵略野心不言可知。余当告知胡统领，请其特别注意。胡乃与延吉厅同知阮公槐联名上书于吉林巡抚朱家宝，复由巡抚转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②，徐又转之外务部，于是外务部有命奉天训练处总办吴禄贞调查边务之

① 孙毓筠是丙午年末被捕，柏氏误记为正月。此“正月”以下均为丁未（1907年）事。

② 丁未（1907年）三月始设东三省，总督是徐世昌，吉林巡抚是朱家宝。

行。余早闻吴为同情革命者，待其至延吉，因即潜心下气，乘机献意见，果相谈甚欢。调余为参谋。胡统领亦派余从吴至长白山焉。事毕，吴回奉天。七月，清政府乃有陈昭常督办吉林边务、吴禄贞帮办吉林边务之命。八月，组织督办公署，吴荐余为二等参谋。余谒陈时，陈警告余曰：“吾闻之汝师谭亦张云，君有革命党声名，希望君改改老脾气，吾人好共事矣。好在有吴帮办，他的雄才大略当可包罗万象也。”吴应之曰：“我不怕，请督办放心。”言毕大笑。余深知吴公乃有心人，陈乃肉食官僚，清廷之走狗。

冬十月，吴昆来延吉。吴为宋教仁、白逾桓之同侣也。是时清政府正在大搜缉桃源宗介等。盖桃源宗介者，宋教仁之化名也。余告吴昆，应注意避开，此间工作由余负责联络，筹资三百元，吴绶卿（吴禄贞号）亦赠五百元，交吴昆由海参威转赴日本。无何，方培良、杨端甫又至，为熊渭耕（熊成基）奔走者也。余为筹五百元，吴绶卿给五百元，交方培良携往接济焉。方熊渭耕在安徽起义失败也，逃往日本。旋由日本潜来长春，寄迹于同学臧姓家。臧父号冠三，待遇亦甚优。熊困久思动，因在日本时与孙竹丹得日本对俄军事秘密计划，拟售与俄国驻哈之郭勉沙尔。临行谓臧父曰：“侄此往必有所得，当以三万金馈赠。”臧喜出望外，冀其成功。居数月，事不协，穷甚，臧则屡屡函问状况，始则渭耕尚有答复，继而久之，音问断绝，臧衔之。适清载洵由西伯利亚返国过长春，吉抚陈昭常至长春。臧密报长春道严某，严密报陈，陈密派中军李某至哈尔滨，将渭耕捕获，于次年春遂遇难^①。当余与吴绶卿筹得千元交方培良携往接济时，切嘱令渭耕速赴日本，以谋安全，乃渭耕得款未及速去，因而被逮。同人疑为孙竹丹所卖，洵大误也。

^① 熊成基，字味根，即渭耕，己酉（1909年）由日本至哈尔滨，不久被捕。庚戌（1910年）三月在吉林就义。

余在延吉阅三寒暑，为进行革命布置，与绿林豪杰往返更多，故各方对余更加注意。幸有吴帮办掩护，虽有多次危险，得到上峰联络而终寝其事。时值腊月，陈督办商之吴帮办，派余赴韩京，沿咸镜北道之会宁、清津、西湖津、元山、釜山以达汉城。斯时日本对韩尚不敢明目张胆吞并其国，以伊藤博文为统监。韩国分为二派。守旧派为闵妃派，如兵部尚书闵东镐等，皆始终抗日者也。维新派为李完用等，皆始终媚日者也。结果媚日者胜，废韩王而日韩合并。余在汉城，为作延吉（日称间岛）交涉之材料，于韩国户部尚书朴姓之子购得一大东舆地全图，价五百元。朴姓有二子，争图价涉讼，日警侦知是图为中国人所购，几经侦查知购者为余，乃下令搜缉，谓为间岛名誉官，系国事侦探。一日，有日本宪兵持一单，写余姓名，来问余曰：“汝知此人何在乎？”余曰：“不知”。因风声甚紧，余避居中国领事府，是时总领事系粤人马廷亮，促余回国，免生外交。余只身乘电车至仁川，搭轮至烟台，转奉天。适吴绶卿亦因公在奉，陈明始末，准撤回。余复由安奉铁路至汉城取行李，又折回奉天；再由长春经吉林，陆行一千一百余里转回延吉。余回延吉不久，吴绶卿亦绕道海参威经琿春回任。乃徐世昌免吴职，而升任陈昭常吉林巡抚，兼任边务督办，以傅良佐为帮办，代理督办职务。傅精刻量小，任用私人，因忌余，乃改余任屯田营管带，驻扎距延吉二百里之三里湾。从此日与虎狼为友，但革命同志会集于此，绿林朋友朝夕过从，反少顾虑矣。

丁未年，余三十二岁。夏，傅良佐与日本交涉失败，因坚决辞职。清政府仍以吴禄贞继任。吴则要求自任督办，专折奏事，不受吉林巡抚节制，方允就职。清政府允之。吴于五月间重游旧地，旧雨重逢更为相喜，而革命准备更为积极。就职之次日，即奏请成新军一镇，成屯田军一标，镇统吴自兼，屯田标统为余。秋九月，吴以

整理军事之故，至余所驻之屯田营，筹商练兵事。一日宿营百草沟，晚餐时吴自吟一律，韵为央黄忙阳觞五字，可惜不记其诗。余依韵和之曰：“虎帐谈兵夜欲央，漏残人静月昏黄。功名已觉三生薄，鞍马空驰十载忙。未遂封侯悲李广，犹堪勋业慕汾阳。待当骄虏平除日，捧献澄清酒一觞。”依韵和者甚多，在此不及备载。可见当时气象万千，所抱希望甚大也。冬十月，吴绶卿计划驻兵地点拟在绥芬大甸子，屯兵五千人以上。嘱余往查，带兵二百人，车马五乘，路经无人烟之地三百余里，雪地露宿者三夜。经大汪清、小汪清、大青岭等处，松柏参天，倒木横地，阻我车马，即时除去障碍，修理道路，始克成行。逾五日，行抵目的地。此处平原二百里，华人甚少，皆韩民之越垦者。余回报后，吴即着手计划布置。不意冬十一月，清政府疑吴有革命嫌疑，将边务根本裁撤。吴绶卿既去，余之屯田营亦即结束。吾人所经营与希望虽告停顿，而在吴绶卿之领导下，所布革命种子分散各地，以后在关内外革命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也。（吴禄贞后被清政府派奸人刺死）^①。

戊申年，余三十三岁。清政府准备征兵，在奉天成立督练公所，以为东北军队之枢纽，内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适余在奉天住闲，由参谋处管总办云程委以二等参谋，月获百四十元，而革命同志相从者，不下三十人。奉天城内有三江旅馆，馆主系浙江人，相待甚优，此馆遂为吾人之大本营。馆账累至七百元之多，馆主人弗之计也。是时为革命奔走最力者，有廖元煌，号燮堂，粤人也；祁耿寰，号醒尘，辽阳人也；徐于，号子俊，鄂人也；所运动联络之对象为冯麟阁部、蓝天蔚部。而商震亦由锦州来奉，入测绘学校，幼年深沉，亦常参加革命活动。当道对余等虽注意，因吾等布置周密，无瑕疵可指也。次年参谋处派余赴俄边调查俄人军事，沿东清线

^① 辛亥革命时，吴禄贞死于石家庄。